满族医学述略

滕绍箴

The Manchu's medicine takes an important share in the world—known Chinese medical heritcge This artitle gives some systematical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hronical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Manchu medicine. Analysis is also done of Manchu's attempt to explore the medicine far beyond its own culture, in which way Manchu's medicine was so enriched and advanced that it could compete with the Han medicine in every way. It proves that the Man ethnic medicine has been integrating and developed with other ethnic medicines in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and unseparated part of the chinese medical culture.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发展史，也都有自己的医学发展史，只是后进民族早期医学缺乏文字记载，医学史是以口碑形式传承于民间，多有失传，致后人引为憾事。正因如此，满族医学发展史资料显得缺乏，几乎无人研究。近年个别学者，不辞辛劳，开了好头。本文拟借鉴于此，并稍加考究，或许有益于推进这个课题的研究，以利于弘扬满族文化。

一、满族人关前后医学综述

俗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满族早期医学是适应环境摸索出来的生存科学。满族入关前后的医学大半起于植物、动物食疗和山水等环境保健方面。如东北的贯众菜，加食盐，或加醋、糖制成酸水食之，可防止感冒、咳嗽；口腔糜烂，可生吃杏叶菜；眼疾可用"空青石"，或吃苋菜；祛痰、平喘、杀虫，可食炒山葱、山梗菜；生津止渴，可食满人制的发糕。满族的诸多粘食 都有较强的滋补性，有利于增强体质，健身防病。

动物性食品也有较强的食疗作用，如具有滋补五脏、六腑、补气活血功效的猪胎疗法；具有延年益寿，益气养血功效的犴达罕制品；味道鲜美、具有大补、强身功效的哈什蟆，用其煮鸡蛋又可补妇女早产、失血过多及痨伤虚损等。调以各种佐料便成各种美味佳肴[1]。

如上的食疗法多深藏于民间，虽然文人墨客难于查找，但它千百年来却哺育了满族和东北各族人民的健康成长，成为中华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满族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是药材生产的重要基地。清太祖曾经歌颂长白山"其山风劲，气寒奇木，灵药应候挺生。每夏日环山之兽毕栖息其中"[2]。满族先世一明代女真人，虽然被文明程度较发达的汉族、朝鲜族称为"野人"，在诸多方面比较后进。然而，在医药学方面，也曾为先进民族提供过借鉴。明嘉靖三十九年（1544），朝鲜李朝中宗大王有病，深感"烦

闷”，本国御医无良药可用，只好“用野人乾水和清心丸”，稍后又“进野人乾水凉膈散、至宝丹云”[3]。其中的“乾水”为何种药，无明文注释。顺治六年六月十五日，旨令盛京两牛录“把干馏的人参水各送一瓶”，用来治疗“骆驼的癞疾”[4]一文，似可作为“乾水”的注释。就是说，在明代女真人那里，早已将人参制成“干馏水”用以治病了。

满族人民很早就懂得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医疗保健。洗温泉治疗病体，无病健身，在朝鲜文献中早有记录。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朝鲜平安道节度使柳珩驰启曰：满浦佥使金应瑞驰报，“奴酋长子弘所土里（褚英）以眼疾率二百骑来浴满浦四日程汝延地温水”[5]。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太祖不豫，“幸清河坐汤”[6]。崇德二年（1637），半个牛录章京来珠，从军出征归来，也“携其妻私往汤泉”[7]。可见，满族入关前，上层贵族利用汤泉治病、保健已成习惯。至顺治朝定有明确规制：“凡给（诸贝勒）假赴汤泉，著以绿头牌启奏”[8]。

17 世纪初年至 19 世纪末年，对满族人威胁最大的疾病是痘疫。顺治皇帝和晚清的同治帝都死于这种病。满族食疗均无良效，只好采取消极办法，即行火攻或躲避。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九月，太祖率四万大军克叶赫兀苏城，时正流行痘疫，破城之后“尽焚其庐舍”[9]。太宗曾数次“免用仪仗”，前往“诸子避痘处”[10]。顺治十二年（1645）三月规定：凡民间发现痘疫，为防止传染，将发病者一律驱逐出京城 40 里，结果有司奉行不力，弄得草木皆兵，以至把刚刚发热，甚至生疥癣者都行驱逐，使“贫苦小民移出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幼女抛弃道旁”。最后皇帝下旨：责“令二部择定村落，”将真见痘者集中一处管理”[11]。由于世祖死于此病，清廷如临大敌。给皇帝吊丧时，凡出痘公主、福晋、格格等人集崇政殿哭临；未出痘的都在城门“西北候梓宫”[12]。

自顺治皇帝逝世之后，满族贵族对痘疫十分重视，一方面规定未出痘的蒙士王公等不得入京，同时令医学界尽力研究，整理中原医学文献。至雍正朝先后写出手抄本的《天花探源》、《热症诊治》等书。道光朝又写出手抄本的《痘症诊治通解》、《重订引痘新法》等书。

满族早期没有医生，除食疗、服药外，多请萨满诊治，故有“病轻服药，而重跳神”之习[13]。至太祖天命时代仍沿此俗，所以朝鲜人李民寏到赫图阿拉等地时，看到的是满族人“疾病则绝无医药针砭之术，只使巫觋祷祝，杀猪裂纸，以祈神。故胡中以猪、纸为活人之物，其价极贵云”[14]。由“绝无医药针砭之术”和猪、纸“价极贵”可知，满族前期医学不发达，对于疾病治疗，尚蒙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换言之，自然食疗、初识药物、重病回避、请神祈求等为满族前期医学不发达的明显特征。

二、满族官方医学的崛起

满族医学从原始奠基时期进入发展时期，始于太宗皇太极时代，其标志是原始萨满教衰落，医生登上历史舞台；先进民族医学的传入和采用。具体说是蒙古医学、汉族医学和西方医学的吸收，使满族医学摆脱了原始状态，进入全面大发展时期。最明显的是伴随后金（清）政权的建立，促进官方医学的崛起。

清太祖时期满族萨满教已经走向衰落，虽有病则“杀猪裂纸以祈神”，尚有求助萨满的习惯，但一方面由于战争加快了满族医学沿着科学道路前进的步伐，同时也由于长期与中原文化接触，满族人对医学并非一无所知。太祖天命十年（1625），他曾对诸臣和国人说：“药之毒者，虽苦口能祛病焉”[15]。说明他们对药性、药理，有病用药之态度十分明确，至少以清太

祖为代表的满族文化阶层具有相当的医学知识。到太宗时期，对中医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开始进行变革。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分析说："人身血脉，劳则无滞"[16]，指出运动有益于血液流通和身体健康的中医道理。表明满族以科学为依据的医学已经冲出以萨满教巫医为主体的原始神秘阶段。特别是皇太极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有力地扼制萨满教巫医活动，使满族医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崇德元年（1636）四月，他下旨说：所有的"端公道士，永不许与家人桃（跳）神拿邪，妄言祸福，蛊惑人心，若不遵者杀之"，力主有病投医，即"有得痘病者，医生能治者治之"[17]。七年十月，多罗安平贝勒杜度有疾，其福金（夫人）"以其病由气郁，令石汉招巫人荆古达至家祈祷"。太宗得知后，将福金、石汉夫妻及巫医荆古达等"俱论死"[18]。在用医生还是用巫人的问题上，太宗以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明确态度，使满族医生登上历史舞台，为满族医学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入关前的满族医生多主治民间痘、疮、眼疾和军中骨伤等疾病。皇太极既将"诸医"[19]推上历史舞台，便积极鼓励他们作出贡献。崇德三年（1638），有医生武振恒因治疗郑亲王济尔哈朗和豫亲王多铎的"眼疾"效果俱佳，得"授牛录章京"官职[20]。

满族是尚武民族，骑马射箭，参加统一战争是清初的民族生活。严格说来，满族官方医学的崛起、发展与这种生活相关联的骨科大有关系。天聪三年（1629），正黄旗满人苏鲁迈在战争中"面中枪"。皇太极"遣医视创"[21]。五年，总兵官佟养性部下士卒在战场上"折足"。皇太极又"遣医往治"[22]。大贝勒代善射猎落马"伤足"。皇太极驰往"亲为裹创"[23]。如此事实表明，外科正骨学在满族民族生活中是常见之病。

从各种资料分析，满族医学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又借助于蒙古医学和汉族医学的引进，特别是适应当时环境，蒙古医学占有突出的地位。早在太祖时代，就有蒙古著名医生墨尔根绰尔济于天命年间率先来归，以"精岐黄之术"受到重用。他曾以药物使"中流矢，命在须臾"的正白旗先锋官鄂硕起死回生，曾用"热镬熏蒸"和"斧椎其骨"以至"手揑有声"的精湛医术，使"臂屈不伸"的患者"即愈"；也曾用"剖白橐驼"，将身被三十矢，又昏绝的都统吴拜"置于驼腹"，立即苏醒。他以"起死回生"之绝技，使满族正骨医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震动全民，赢得"神医华陀"[24]称号。

清代蒙古医学已经构成满族新兴民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史籍中不乏记述，如有一位名叫周尚白的人，一日驱车出关，不幸为车轮断股。一名蒙古医生置其"股于冰，令僵，徐剖肉视骨"，骨已"粉碎"，便快速"为联缀桑皮，纫之，饮以药"，第五日便"能行矣"[25]。乾隆四年（1739），京师某官，"以奸仆妇，被妇咬（断）舌尖"。急请蒙古医生诊治。医生杀狗取舌，"带热血镶之"，百日痊愈。面见皇帝时，"奏对如初"[26]。

清代医学机构继承明朝制度，设有五品衙门的太医院，内设首长一人，名曰院使，秩正五品；副职 2 人，名曰左院判、右院判，秩正六品，均称"堂官"。其下有御医 13 人，秩正八品。吏目 26 人，秩从九品。医士 20 人，医生 30 人，都未入流。但医士许用从九品。太医院设有教习厅和医学馆，专为培养医学通才，分中学班（学制五年）、高等班（学制八年）[27]。清代太医院之设最早当在太宗天聪初年，任命御医"韦尽性为左院判，允祖为右院判。[28]。

在清代的太医院中，"凡侍直，自院使至医士，以所业专科分班侍直。给事宫中者，曰宫直；给事外廷者，曰六直。宫直于各宫外班房侍直，六直于东药房侍直，各以其次更代"[29]。除太医院外，另有"官医"，专治监犯的疾病。负责内外监狱患者治疗，官方供药，选设医生 2 名。年终考核，治愈率高低记录之，六年届满，"在内咨授吏目，在外咨授典科训科。[30]。

清朝自太祖太宗时代开始，诸帝都注重满族医学的发展。自满族入关，医学更引起皇帝的极大关注。清初礼部祠祭司郎郭一鹗曾奏云：我皇帝“留意医药”之事[31]。顺治十六年(1659)，福临曾科学地分析云：“尫羸之夫，病之初、中，尚在肤膜腠理之间，中医犹能按脉而治，及耽日久，深入膏肓，虽有卢扁救疗安施，岂非天所废，莫能兴之”[32]。显出皇帝已有较高的医学知识和水平。同时对于具有精湛医术的医生继续推行鼓励政策。顺治十年(1653)六月，因治愈孝庄皇太后病，致“圣体康宁”，满族医生雷鸣德被授“三等阿达哈哈番，晋升一级”，医生方文英、刘国栋、张希皋等“俱各加一级”，祝世遇加太常寺卿，仍官太医院吏目事”[33]。

顺治朝是满族医学全面发展的时期，其特点是努力培养本民族医学通才；继承本族膳食医药学；弘扬蒙古医学；积极吸收汉、回等各族医学，乃至西方医学。

清代太医院学员的来源是“选上三旗士卒”，每旗限额十人。培养对象十分明确，即造就本旗医学人才。这些学员一般在本旗已有相当的医学基础。其中擅长正骨科的学员，送到上驷院，名为“蒙古医士”，显然是因继承蒙古骨科医学传统而得名。他们的职责是“禁廷执事人有跌损者，咸令其医治”，要求医术精通，医法亦严，每治病“限以日期报愈，逾期则惩治焉”[34]。如有齐召南侍郎，曾从马上摔下，头部受重伤，“脑岑岑然”，急请蒙古医士诊治。诸医“以牛脬蒙其首以治之，其创立愈”。显然，其医法与墨尔根绰尔济医生剖白橐驼腹，置都统吴拜于腹中是异曲同工，以牛代驼，也算因时制宜之策，是对蒙古医学的继承和灵活运用。乾、嘉时代在诸多满族医生中，以觉罗伊桑阿的医术最精，史称他“以正骨起家”，其授徒之法是“先将笔管戕削数段，令徒包纸摩挲，使与其节合接，如未破者，然后如法接骨，恒奏效焉”。据载，当时有一个人坠马，“别无痛苦，惟两足欲前行而转后却”。请蒙古医士诊视。医士诊后，并不用药，只令两名壮士将患者举起“对掷之”，相互对掷数十次后，患者“步行如常”。原因是坠马时“肝叶翻背”，用药无益，“惟举掷方能舒展反正耳”[35]。由此可见，满族医生完全掌握了蒙古医术。

顺治、康熙年间，满族在吸收汉族医学文化方面，更远胜蒙古医学。前文所叙，在为孝庄文皇后诊病的医生中，除满族医生雷鸣德（汉军旗人）外，方文英、刘国栋、张希皋、祝世遇等都是著名汉医。汉族医学最大的优势是古籍极其丰富。世祖晚年，曾指令搜集有关汉族医学书籍，综合整理，汇编一部《医疗通书》，用以丰富满族医学宝库，也是清入关后整理汉族医籍之端。

清代大量吸收汉族医学精华的工作始于康熙朝。圣祖玄烨精通中华文化，在医学领域亦堪称里手。他“留心医理，熟谙药性”，经其潜心研究，认为行医的关键在于对症下药。一次在晓谕群臣时作了深刻地论述，指出：“圣贤道理俱有一定之论，至于医卜星相，言人人殊。世间庸医于寒热虚实率未能辨，南人喜用补，北人喜用泻，皆非适中之道。大抵温补之药，其效甚微；酷烈之药，其效立见。方书所载汤头甚多，若一方可疗一病，何用屡易。西洋有一种树皮，名金鸡勒，以治疟疾，一服即愈，可见用药只在对证（症）也”[36]。

为使满族尽快了解中华医学真蒂，康熙朝及其以后，较突出的成绩是大批整理、翻译汉籍医书。其中的译著有《雷公炮制书》、《寿世保元》、《脉论》、《王叔和脉诀》、《诸病论》、《医要集览》、《难经》、《药性赋》、《难经脉诀》、《律例馆校正洗冤录》、《上药王源流》、《答医方明》、《长寿佛经》、《奇门》、《沐浴经》、《孙思邈卫生歌》、《经穴部位图》、《延寿格言》、《妇科疗法》。兽医方面译有《马经》、《相马经》、《马经全书》等[37]。这些医学译著，或是直接

译成满文，或是满汉合璧，对于培养一代满族医学专家和推动满族医学的发展都起到了桥梁作用。同时，命大学士鄂尔泰组织名医编辑《医宗金鉴》一书。终清之世，此书作为太医院投方取药的依据。

清代的上驷院，除满、蒙医生外，对于回族的医术也兼收并蓄。道光朝以后，旗籍回医将阿拉伯医药学，结合满、蒙医术，创制出专治外科、骨科及有关病症的膏药。其特点一是张儿大，膏药片薄，一是张儿在中等，膏药较厚。前者是金大夫所制，后者是王大夫所为。其效甚佳，名噪京师，家喻户晓，所以形成京城歇后语，谚称："金回回的膏药——张儿大"，"王回回的膏药—真厚"⑱。这些旗籍回民所掌握的阿拉伯医术，在上驷院中都成为满族医学的组成部分。

清圣祖不仅注重中华医学，也时刻注重吸取西方医学技术，甚至连西洋的一种树皮—金鸡勒能治疟疾的成就，也纳入自己医学宝库之中。为了发展满族医学，充实中华医籍，玄烨在向西方传教士学习、研究西方人体解剖学之后，命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用满文翻译一部解剖学，赐名为《钦定骼体全录》。乾隆年间又将圣祖时代由西洋传教士白晋、张诚等所撰医学文章辑成《西洋药书》藏于内务库。同时，清代太医院医学馆中的高等班，所学也以西医课程为主，兼学中医，使满族医学又带上中西医相结合的特点。

三、满族民间医学的发展

满族早期民间医学家有：庆恕，著有《医学摘粹》；文通，著有《百一三方解》；奇克唐阿，著有《厚德堂集验方萃编》；晚近的名医边成章及其诸子，其孙增智，著有《气化探源》；杜自明，著有《中医正骨经验概述》等。其中庆恕的《医学摘粹》在晚清有较大的影响。

庆恕，字云阁，辽宁省抚顺县人，少年酷嗜儒书。偶因母病"几为庸医所误"而激之钻研医学。经十年（27 岁到 37 岁）奋力阅读医书，医术颇有长进。但也只是'稍入室而未能登堂"。光绪二年（1876）考中进士，晋升京官部曹，调任西宁大臣。民国元年（1912）离任，迁住沈阳，被聘为中国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居官期间从未间断民间医学活动。在他医学研究的道路上，首先吸收中华古代医术精华，精心阅读了徐灵贻、陈修园、高士宗、张隐庵、黄元御等诸多名家著作，体会到其著述"皆远宗轩岐，近法仲景"，从而探知《内经》、《伤寒》、《金匮》各书是"万世医学之祖"。又经 20 年研究，终于通晓中华医学精髓所在。在对经典医学著作的阅读中，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认真总结临床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其水平之高竟对中国经典医学著作辨认真伪，曾在他的著作之后列有十五部医学经典评述，现列六部以供欣赏。这六部中，前三部充分肯定，后三部批判地肯定。

《内经》：溯自轩岐著《内经》，医林从此得见型。道通天地真神妙，参透玄机用独灵。

《难经》：扁鹊当年有盛名，《难经》著出义尤精。古书奥旨偏能解，得此传人道益明。

《伤寒》：仲景《伤寒》奥蕴宣，立经立法得真传。后人研究长沙术，入妙神通便是仙。

《孙真人书》：唐朝思邈著《千金》，医理阐明义亦深。独怪书多偏杂处，令人读后费推寻。

《医宗金鉴》：钦定医书救众生，几经寒暑告功成。当年编选无名手，费尽心机著未精。

《本草纲目》：百草神经药性真，因使《纲目》又翻新。不分纯杂全收入，后世流传定害人。

在精心研究医学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庆恕以《内经》为依据，旁征博引后世名著加以补

充，“扬弃其糟粕．汲取其精华”．将望色、闻声、问症、切脉、杂诊等法，结合长期临床实践，“提要钩元，削肤存液”，编著《医学摘粹》一书。由于著述“句句有所本，文笔流畅，易读易记．切于实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出后，先后于1897年、1913年、1915年、1916年五次刊印，“愈出愈精”，在北京、甘肃、沈阳等地广为流传。198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新点校之后，再次出版。

《医学摘粹》的内容是摘取古代医学经典著作与辨正施治有关的精华部分汇成，共分七大部：《伤寒十六证类方》一卷、《伤寒证辨》一卷、《四诊要诀》一卷、《杂证要法》三卷、《本草类要》一卷、《伤寒证方歌括》一卷、《杂病证方歌括》二卷。书后附黄元御《四圣心源》里的《天人解》、《六气解》两篇及庆恕的《论书诗钞》。是书将伤寒113方的辨证施治“因证类方”．以达到“无病不疗”的水平。

当《医学摘粹》首次在京刊出时．震动京都．一时“问方求诊者，接踵其门”。庆恕以高超的医术，只要“投以刀圭，无不立瘥”[40]。光绪二十年（1894），庆恕再次入都，友人因重病求治，他前去“理方诊脉，立起沉疴”。三年后，有同乡明保患病，心、肺、胃“三火上冲”，临床表现为“龈烂唇肿，作胀作痛”，心绪烦躁。庆恕诊脉投药，“一剂而轻，再剂而愈”。于是《医学摘粹》一书和作者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欢迎，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此书是“纯与《伤寒》、《金匮》一气贯通，酌古准今，悉臻美善”之作，是“迷途顿辟．荒径别开，发前人之秘蕴．得此道之真传．实从古未有之奇编”。指出作者“发二千年来未发之秘，真仲景之功臣也”。此书更有益于后学，使之在汉唐以来“不下数万卷，纷纭错杂”的医籍面前，不至“望洋而兴叹”．起到“渡津之宝筏”的作用[41]。为满医继承中华医学文化，加以创新树立了光辉榜样。

清代满族在医学领域另一位名医是边成章，隶满洲镶红旗．居住在河北新城县浒洲村。他自幼“嗜书”，喜欢医学，凡“岐黄之书．无不尽读，夜常背诵，偶有遗忘，燃火照之，不举烛也”；听到哪里有“秘方”虽千里“必求得之而后已”。他“擅长疡科，能发明疑难大症”。边成章精通气脉之术，其子宝钧、宝善、宝和、宝恒分别“各精一科”．即针灸、内科、儿科、外科。次子宝善对于“内科之气化病，尤为独道”．熟悉中华《内经》和汉代名医张机（字仲景）的《伤寒论》、《金匮》二书，经多年潜心研究，批评明人李东恒作为“一代名医”，竟不明“三焦”，即张机的医学理论。宝善之子增智．承祖、父之业，对经络气化学，颇有造诣，撰写数十万言的医学专著《气化探源》[42]，为沟通中西医学起了桥梁作用。边氏祖孙三代，为继承、发展和弘扬祖国医学文化，丰富满族医学宝库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满族骨伤科专家杜自明，出身于成都八旗驻防贫苦满族家庭，承父武功与“骨科秘方”寻师访友．医术日渐精湛，成为地方名医。积多年临床经验，著有《中医正骨经验概述》一书。力主“练功疗法”，总结“体功治疗功势”20余种，研究出硬、软伤治疗手法和临床治疗十大要领，并研制出接骨散、活血散、玉真散、内伤丸、活络丸、除湿酒、活血酒等七种有效方剂。在继承中华医学遗产和发展中华骨伤科医学方面作出了卓绝的贡献[43]。

此外，清末民初以来，著名于一时一地的满族医学专家还有“尽得岐黄真传”，以至于“著手成春，名冠一时”的关永清、“医术精深”的方脉学专家曹怀庆、医疗心理及中医针灸按摩专家佟幼生等[44]。这些满族医学专家．不仅继承中华医学宝库中的精华，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医德。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荣庆和溥僎。

荣庆．镶白旗蒙古笔帖式．官至户部江南主事，晚年告归．“以医道行乡里”，凡遇“贫

乏之家”求医，则“不受酬金”，分文不取，且主动“施以药”[46]，声名享誉一方。溥僎，清末端郡王载漪长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变后，其父流于西北，暂住甘州。其家口日增，生活困窘。溥僎早年随太医院赵立臣学医数十年，遂行医于甘州。由于医术精湛，名震一方、致甘州永胜大车店外，求医讨药者百里而至，络绎不绝。集众日多，商贾闻风而至，遂成市集。然而，溥僎虽行医解困，却仅取富绅“敬仪”与“礼金”，贫者登门就医“分文不取”，并购药济人。民颂云：“镇国将军给百姓看病，自古以来所未有”[47]，人皆感激涕零。

综上可知，满族医学是在本族天然医药学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华各族医学成果，加以创新，汇集而成，是中华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

①㊲ 参见于永敏著《满族药膳与食疗经验》、《中国满文医学译著考述》两文。

②⑥⑨⑮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第2页；卷10，第21页；卷4，第9页；卷9，第18页。

③⑤ 《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卷105，第681页；光海君卷10，第248页。

④ 《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第113页。

⑦⑩⑯⑲⑳㉓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5，第19页；卷11，第15页；卷24，第3页；卷51，第26页；卷43，第25页；卷49，第9页。

⑧⑪⑫㉛㉜㉝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33，第5页；卷14，第13页；卷2，第6页；卷78，第5页；卷124，第10页；卷113，第22页。

⑬ 《全辽备考》卷4，第13页。

⑭ 《栅中日录》第28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油印本。

⑰⑱ 《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第13页；卷63，第125—126页。

㉑ 《清史稿》卷233，第9388页。

㉒ 《满文老档・天聪》卷10，第51页。

㉔ 《盛京通志》卷40，第3页。

㉕㉖㉚㉟ 《清稗类钞》第30册，第122、132、101—102、103、103页。

㉗ 《清代太医院》。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3期第49页，第53页。

㉙ 《清宫述闻》第144页，198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

㊱ 《清朝野史大观》卷11，第29页。中华书局本。

㊳ 《北京土话中的满语》第79页，1993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㊴ 《医宗金鉴》，清乾隆十四年（1749），大学士鄂尔泰奉敕撰，计90卷，清代官医审证处方，多本于此。

㊵ 刀圭，即少许钱的药。瘥，即愈。

㊶ 《医学摘粹》序二，1983年，上海科技出版社。

㊷ 《河北省新城县志》卷12，第460--464页。

㊸ 参见杜琼书等《著名满族骨伤科专家杜自明》一文。

㊹ 因篇幅所限，佟氏医绩将另文发表。

㊺ 《岫岩县志》卷4，第12页上。

㊻ 《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26—127页，1990年4月。